

# 网络符号冲突：理论逻辑、符号实践与话语功能<sup>\*</sup>

曹 洵

**摘 要：**符号分析开辟了网络冲突性公共话语研究的新视角。本文首先从哲学根基、分析路径、理论支点三个层面廓清了这一研究主题的逻辑预设和基本理论架构，认为符号冲突研究路径的形成受到建构主义范式转向、哲学的语言学分析转向、微观权力观转向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接着本文结合具体实例，阐释了网络冲突性符号如何通过接合实践进行权力的表征运作：以符号能指—所指的任意关系为逻辑前提，经由聚合（联想）关系建构新的意义体系，运用符号的多层意指实践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文章进一步指出，“抵抗”与“对话”是符号冲突两种重要的话语功能：网民通过建构“替代性话语空间”，形成有别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体现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但同时，也借此传达对话与协商的意图，背后是促进社会改良的积极愿景，体现以语言交往的主体间性为特征的互联网的对话精神——后者往往为当前许多研究所忽视。

**关键词：**网络符号冲突，接合理论，意指实践，抵抗，对话

## Online Symbolic Conflict: Theoretical Logic, Symbolic Practic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Cao Xun

**Abstract:** Semiotics offers a new approach to online contentious public discourse

---

\* 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微博舆论场域中的对抗性话语研究”（14CXW016）成果之一。

study. This essay first clarifies the presuppositions of and a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online symbolic conflict study in three dimensions: philosophy, analysis, and theory. This approa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ree kind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constructivism in paradigm studies,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and the concept of micro-power in ideological analysis. Second, the essay shows how conflicting symbols work as micro-power representations via articulation practice, with concrete examples. Finally, the essay shows how ideology is reproduced through multilayered signifying practices, taking the arbitrariness of signifier-signified as the logical premise and constructing new meaning systems through paradigmatic relations. It is also noted that resistance and dialogue are two important discourse functions of symbolic conflict. Chinese netizens, for example, have constructed an “alternative discourse space” to resist the leading ideology, which reflects the awakening of civic awarenes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onflicting symbols convey the inten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official ideology, indicating an active vision of social improvement. This reflects the dialogic essence of the Internet, characterised by inter-subjectivity based on lingual conversation, which is easily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Keywords:** online symbolic conflict, articulation theory, signifying practice, resistance, dialogue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2008

## 一、符号冲突：网络公共话语研究的重要视角

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普通人日常的表达途径，“网络抗争”研究（包括更宽泛的基于网络的公共表达与政治参与等话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研究立足政治学—社会学交叉的学科视野，以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探讨互联网情境下的抗争政治与社会动员机制、政治机会结构、情感动员过程等的关系，揭示抗争的影响与生发机制。或者以商议民主（协商政治）为视角，将之视为公民在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探讨网络表达与公民社会形成、政治决策机制变化与公共领域建构之间的关系。至今，这些仍是主要的研究视角。

它们的共同点是：第一，多采用宏观政治的理论视角，即关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机构化的政治，将网络抗争作为网民利用互联网对权力的抵制

和反拨；第二，将抗争视为一种行动，具有明确的诉求（如讨薪、反对拆迁和征地等），企图对现实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对抗争过程、抗争中各主体及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力图揭示网络抗争的机制化运作系统、勾连不同主体及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扩展与深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网络抗争中的话语、符号、文本问题，即抗争中的语言表征系统和意识形态运作。这些研究立足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将网络抗争视为符号制造和意义生产的过程，着重阐释符号的表征机制，揭示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有研究者（李红，董天策，2012）明确指出，符号学是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新路径。这一路径越来越受重视并非偶然。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运动的主体、对象、形式、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不是关心社会产品的分配、政治权力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安全，而是强调个体与集体的社会认同，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质疑统治阶级的价值逻辑，并最终完成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命名方式的根本性解构。”（Deluca，1999，p. 25）运动的目标是争夺对符号的控制权；运动的过程是“一个以促进个人自主和自决为宗旨的表达性过程”（冯仕政，2013，p. 269）。在组织形式方面，“并非正式的组织化结盟（或政党性结盟），而是强调一种非等级的、非正式的草根网络”（Deluca，1999，p. 26），一种“松散的、隐蔽的、潜在的、易逝的社会关系网络”（冯仕政，2013，p. 269）。也即是说，它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运动，以非暴力的话语形式实现社会意识的集体转型，这也正是我们所关注的网络符号冲突的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互联网自身的符号本质决定的。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2004，p. 34）从互联网诞生开始，虚拟性、符号化便是其内在特征。在互联网上，符号成为唯一的沟通媒介，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生产意义、制造认同的唯一源泉。互联网时代更加印证了卡西尔的论断：“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2004，p. 35）因而，以符号视角来观察和理解网络冲突性话语现象，切中了互联网虚构性和关联性的符号本质。

纵观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场域，网民所创造和传播的各种符号层出不穷，构成“符号狂欢”的海洋。网民借助符号生产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质疑其话语的合法性，拆解已有的意义体系，创造新的符号或言说方式，建立新的意义体系，等等。这种种努力，或许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对社会现实产生明

显影响，但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不断形塑社会观念，致力于实现意识深处的根本转型。这种通过制造和使用特定符号来表达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意见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符号冲突”。相应的，这些符号称为“冲突性符号”。网络的“符号冲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些符号本来没有，是网民通过拼贴、挪用、重组等方式加工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费斯克所说的大众能动的“生产性”；

第二，符号生产体现了意识层面的反抗与抵制，多数并没有相应的线下活动；

第三，符号冲突往往没有明确的诉求，只是对某些对象的揶揄、讽刺、调侃、戏谑；

第四，对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难以产生直接的、可测量的影响；更多是意识、观念的长期的、隐性的影响，并取决于其他大众的解读和阐释。

网络符号生产的这些特征，使以宏观政治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协商政治视角等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符号分析视角的重要性由此显现。

## 二、网络符号抗争研究的逻辑前设与理论架构

任何一种研究体系或研究路径都有其所倚赖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前设(presuppositions)，它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层面框定了研究的基础和底层架构，保证整个体系在逻辑上的自洽融通。下面，我们将从研究范式的建构主义转向、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意识形态研究的微观权力转向这三个层面，对抗争研究符号学路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架构进行梳理。

### (一) 哲学与方法论根基：建构主义研究范式

建构主义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被视为对弊端日益暴露的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拨和超越。建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

(1) 本体论：与本质主义相对，认为世界是多元和建构的，并不存在实在的、独立于认识(语言)之外的本质；(2) 认识论：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3) 价值论：认为研究过程受价值制约，不存在价值中立的研究；(4) 通则化：认为超越时间和情境的通则化是不可能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情境；(5) 因果联系：认为区分原因与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果处于相互转化和制约过程中；(6) 分析逻辑：强调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塔沙克里，特德莱，2010，p.9)

建构主义范式对符号学研究影响深远。因为我们通过符号/语言来认识和

表达世界,语言是一种意指实践,它通过表征的运作系统生产意义,因而“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而被建构的”(霍尔,2003,p.19),意义的运用使文化渗入整个社会,这种理解便是建构主义的。符号学是“对各种符号以及它们作为文化意义运载工具的一般作用的一种研究或‘科学’”(霍尔,2003,p.8),即研究符号如何产生意义,表征如何运作,亦即文化研究中的“诗学”路径。这构成了我们理解网络符号冲突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根基。网民围绕公共议题制造各种符号就是争夺意义、维护或建构话语合法性的文化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普通民众得以参与到文化的循环中。这种将符号、语言、意义与文化,通过“表征”这一概念有效勾连起来的思考方式,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 (二) 分析路径:回归社会—历史的情境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其主要特征是: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从“可以认识什么”向现代哲学“言说什么”问题的转换;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转到了对语言的社会—历史探讨;从热衷构造理想语言转向对日常语言的关注。(洪汉鼎,2011,pp.4-6)这一来自顶层哲学思考的革命性转向,激活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语言”成为从哲学领域到人文社科具体研究领域的研究焦点。在这一转向中,符号学越来越成为显学,正如赵毅衡所言:“符号学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公分母。”(2009)其中,分析哲学的日常语言研究转向对当前符号学分析的影响尤为深远。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认为:(1)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而非一种不理想状态;(2)“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在于它的用法”,因而语言具有不同的功能;(3)“语言与行为相关联,讲话就是做事”,并发展了出一种言语行动理论。(洪汉鼎,2011,pp.4-6)这些基本观点都内在地要求对符号产生的情境的重视,故被称为符号研究向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归。诚如日常语言分析学派著名学者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所提倡的,深入到“文化、时代、讲话者、听者、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的背景中去”。(洪汉鼎,2011,p.41)

以上基本观点有助于帮我们透视各种冲突性符号的实质。比如从语言的规范性看,网民所制造的不少流行语(词)、新字等,不符合构词造字的规范,常因“不入正统之流,难登大雅之堂”而被忽视或贬抑。但实际上,这些符号来自网民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是广大网民在公共生活中对共享经

验的集体表达，因而应被视为“完善的”“有意义的”而被认真对待。第二，对于网民制造的奇奇怪怪的符号，之所以难以常规来理解，是因为不能只看这些符号指称了什么，还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即制造符号的动机、语境、意义如何阐释或演变等，这才符合符号研究的社会—历史语境路径。第三，对符号冲突的作用，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即时性、娱乐化的大众狂欢，不但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加剧“去政治化”的犬儒心态。这种观点没有把符号生产看作一种行动，这种行动的特殊性在于它以集体生产的方式，促成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共识的形成。

### （三）理论支点：作为微观政治的话语与权力

“语言学转向”的文化研究，不仅关注“语言如何产生意义”的诗学问题，而且关注“表征的后果和影响”——由符号构成的话语体系如何与权力联结，如何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被配置。（霍尔，2003，p.9）这将我们带入另一层面——语言的政治学问题。语言的政治学问题也经历了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向。

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文化领导权”（Hegemony，也称“霸权”）概念，代替传统的“统治”概念，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实际上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进而是政治的领导权”的争夺上。（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2004，p.429）对于大众文化而言，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被深深卷入争夺、赢得、丧失和抵制霸权的过程中”，以“接合”（articulation）的动态形式进行着这种旷日持久的谈判和斗争，由此，“霸权理论开拓了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潜在力量的大众文化领域”。（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2004，p.431）这便是意识形态理论的“葛兰西转向”。

欧内斯图·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在葛兰西“接合”观点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地提出了“接合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结（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接合）实践的结果。”（2003，p.114）具体来说，“接合是一种构建意义元素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正是借助意义接合的方式，人们的认同被改变……因此，接合实践存在于符号结点之间的意义建构中，由于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接合与固定，符号得以运载某种具有偏向性的意义，然而不可否认，这种意义建构的偏向性依然可以在社会意义的开放性（openness）中进行解释。反过来，伴随着话语性场域变得愈加复杂且没

有边界，每一种话语的持续溢出（constant overflowing）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Laclau & Mouffe, 1985, pp. 105-113）。“话语溢出”现象，意味着符号与意义之间，或者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浮动关系——不同的话语都试图将事物的意义固定到自身话语所构造的话语结构中，便出现了争夺符号意义及符码连接的领导权的“符号斗争”（symbolic struggles）——这种符号意义浮动的、不稳定的状态便被称为“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Laclau, 1993, pp. 329-343）。“接合实践的直接作用就是借助修辞的方式”改变“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通过制造全新的能指符号来支撑特定的意义网络”（刘涛，2011，p. 186）。上述基于微观政治的“接合理论”也是我们研究网络符号冲突的基本观点。

### 三、网络符号抗争的接合实践与权力表征

在厘清符号抗争研究的哲学基础和逻辑预设之后，我们便可以运用符号学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工具，针对具体的符号抗争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近年来主要的符号冲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网民造字。网民将生僻字发展新义，如“囧”“天”；或将不同字的各部件重新组合，如将“脑”和“残”组合成的“nan”，由“砖家”“上访”“拆那”“一小撮”等组合成的一系列新字。第二，盖楼。网友以相对统一的形式在评论区进行回帖，形成视觉上整齐的“楼层”形状。如讽刺教育部对汉字的调整而发起“26个英文字母整形”的盖楼（腾讯网，2009），针对某地政府对公用烟的保护性规定进行戏谑的“发来贺电”盖楼（荆楚网，2009），质疑媒体中的数据来源而进行的“八成群众”盖楼（白剑峰，李红梅），等等。第三，PS图片。网民围绕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议题，运用PS技术创作各种恶搞图片，表达公民态度或诉求。如“领导悬浮视察”恶搞图片（易财网，2013），“为名画穿衣”恶搞图片（现代快报，2013），等等。第四，自创卡通形象。如针对网络清理行动发明了“草泥马”形象，针对工信部规定安装“绿坝”软件而发明了“绿坝娘”，根据“躲猫猫”事件而创造出“多毛猫”等。下文从“符号冲突”角度对上述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探讨。

#### （一）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符号生产的逻辑前提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符号就是一个意指之形式（能指）……和一个被指的概念（所指）的结合体”（卡勒，霍尔，2003，p. 31）。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武断的——能指与

所指的结合并非符号本质的、天然的特征，而是人为的，具有某种偶然性。他认为任意性是符号的基本特征。符号这一基本构成原理，为我们理解网民创造的千变万化的符号提供了分析理据。

譬如造字本来是严肃的事，非专业机构不能为，但普通网民也能轻易地造出“新字”，并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可，这是因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网民所创造的各种“新字”，无论是“脑残”“上访”“拆那”“屁民”“五毛”“已阅”“一小撮”“草泥马”等<sup>①</sup>，大都是提取原有汉字的部分笔画，再将几者进行会意组合，从而“制造”出新字来，其意义与组合前的原词汇基本相同，也有个别以谐音的方式生产新义（如“拆那”指代“China”）。按照这种“造字原理”，各种偏旁部首的组合都能轻易产生出新的“字”来。同样，自创卡通形象也体现符号的任意性特征。网民想象（拼贴）出一个新的形象，对其命名，并赋予其意义。这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组合是偶然的、任意的。这意味着若换作其他的形象也是可能的，就像“绿坝娘”一开始有多个版本，最终以一个更受认可的形象得以流传。再如“领导悬浮”“名画穿衣”的例子：可用于“悬浮视察”的场景、可“穿衣”的人体画数量上近乎无穷，能创造出多少版本只取决于网民的创意。也正因为能指与所指间的任意关系，在表达同一个意指时可以有无限的能指，这使得哪怕在一个细小的话题上，也可以“创造”出无穷的符号。

网民种种符号抗争生动地诠释了“接合理论”中“浮动的能指”——网民充分利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浮动关系，建构出新的接合关系，将新的意义注入这一话语结构中，以此传递某种偏向性的意义，从而参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 （二）符号的聚合关系：冲突性符号的运作方式

能指与所指的组合可以是任意的，但符号要能被他人所理解，需要有共享的语境。形形色色的网络语符能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就在于每个符号都意指了网民所共享的意义——一种对当前社会现实、文化环境的心照不宣的共识。这种共享的意义在符号中体现为特定的运作方式。

索绪尔认为符号通过两种基本方式运作，一种是组合关系，他称为“句段”（syntagmes）；一种是聚合关系，也称“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fs）。

<sup>①</sup> 因为新字与原词汇意思基本相同，且没有规范的汉字可对应，为使表达通顺，仍使用造字前的原词汇来指代新字。



前者以词项的线性连贯排列为基础；后者按照类似原则出现在心理联想层面，是潜在的一系列虚拟的记忆。（巴特，2008，pp. 42-43）后来的符号学家把以上术语改称为组合轴（syntagmatic）和聚合轴（paradigmatic）（赵毅衡，2011，p. 159）。赵毅衡认为组合属于表层结构，聚合属于深层结构。（2011，p. 161）网络冲突性符号的生产更多以深层结构“聚合轴”的形式运作，即通过不同网民对同类事物的联想，生产出形式丰富而服务于同一个主题的系列符号。这些系列符号在更大的范围内组成一个形式上更复杂、更有机的符号体系，其内在含义超过了各个子符号的总和，成为一种“超级结构”。

以此来理解“网民造字”，与其说这些是“字”，不如说是网民用于表达某种共享意义的特殊符号。用哪两个字进行组合看似随意，实际上却来源于已有的、意义明确的词汇，并且与当前某些社会现象、事件有密切关系。其他网友通过新造之字，去联想组合前的词汇，从而领会到新“字”的实际含义。新字是对旧义一种曲折隐晦的表达，通过这种逆向的解码方式，编码者（造字者）的意图更为明确生动地传递出来，产生组合之前所没有的反讽效果，并与解码者产生强烈共鸣，也即费斯克所说的“生产者式的快感”。具体来说，“chaina”（拆那）是“China”（中国）的谐音，暗指城市化过程中的拆迁现象，它又可以与“上访”“维稳”一系列现象形成聚合关系（拆迁过程中引发了不少冲突事件）。“屁民”是网民对自身人微言轻的自嘲；“一小撮”“不明真相”是用于捣乱分子的形容词，但有时却成为对维权群众“污名化”的托词。因此，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词汇，却以某种联想关系联系在一起，体现网民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矛盾冲突的一种戏谑性回应。再如“已阅”“同意”是对官僚作风的讽刺；“专家”成了“傻瓜”“脑残”的代名词；“五毛”是对特定群体的讽刺，反映网民对网上一些言论的不信任。这些符号以聚合的方式，通过激发人们的联想唤起对当前社会现实的集体共鸣，这种共享意义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一种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情绪。这些例子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网民要将这些词汇造成字？而走红的又恰恰是这些字？”

网民的“盖楼”式回帖也是典型的聚合式表达：在形式上是对元文本（最早的创意文本）的模仿，通过对内容的局部修改，而构成聚合关系。上面提到的“发来贺电”盖楼，其联想（聚合）的元素是全国各地的烟草名企，从而引发人们对烟草企业与当地政府组成利益共同体的“官商合谋”的联想；“贺电”的言说方式则表达了对此现象的辛辣讽刺。而“八成群众”盖楼活动中，聚合元素是媒体报道中的满意度调查，从住房拥有率到 H7N9 防控工

作，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网民借此质疑媒体调查数据的真实性，讽刺媒体制造了“被代表的民意”。

### （三）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抗争符号的权力表征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一种关系”（2009，p. 173），这种关系通过两重运作实现意义的生产：第一层是“直接意指层”，是“单纯的、基础的、描述的层次，在那里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大多数人会认可其意义”；第二个层次是“含蓄意指层”，其意指作用更“普遍、综合和芜蔓”，“正是通过它们，（文化的）外部世界才渗入（表征的）系统”。（霍尔，2003，pp. 38—39）网民根据云南“躲猫猫”事件创造出“多毛猫”卡通形象，根据“绿坝软件”虚构出“绿坝娘”卡通少女形象，将羊驼转化为“网络神兽”“草泥马”形象等，从符号学角度，这些视觉形象通过符号的能指、所指的表征系统运作，再生产出新的身份象征和权力关系。

举例来说，“多毛猫”这一卡通形象的能指，是一只类似猫的卡通玩偶，指代了一种性情“时而温顺时而暴躁”，为争夺食物和地盘会“进行激烈的搏斗”，且“视力差”“易受伤”的猫（百度百科，2009）——这是创作者赋予它的含义。而“多毛猫”与“躲猫猫”谐音，通过谐音的联想关系，以及“多毛猫”的特征描述，其含义转移到“躲猫猫”上，形成了该符号的含蓄意指：2009年发生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内的“躲猫猫”致死事件。而这一事件又与监狱管理不规范，警察玩忽职守等意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多毛猫”丰富的意义链条。这一整体性的意义系统，又进一步指向了广大民众对司法刑侦系统“依法执法，保障人权”的诉求。

根据这一符号表征机制，“草泥马”符号的能指，是羊驼这一动物形象，直接意指一种温顺可爱，却又勇敢顽强的动物。其含蓄意指是网民受到各种形式的言论规制，但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规避，并对这一行为表示不满和不屑。这一含蓄意指与反对规制、倡导表达自由等意义联系在一起。同样，“绿坝娘”的符号能指，是虚构的卡通少女形象，直接意指是外表可爱、做作、虚张声势，实际上外强中干的“执法者”，含蓄意指是某些权力机构以“过滤不良信息”为由对互联网实施信息控制，它同样与倡导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等意义紧密联系。

这些新创的符号在传播中能够被其他网民“解码”，引起共鸣，说明符号创造者（编码者）与其他网民（解码者）属于共同的文化群体，有着共同的

经验,能意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这种“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所谓的“主体间性”(李岩,2005,p.24),体现了巴尔特所言的第三个层次的符号意义生产。以上各个形象共同构成了“反对公权力越轨,诉求法治”这一象征意义。网民借这些可爱的、搞怪的视觉形象,与深层次的社会批判、权利诉求建立了随意而巧妙的联系——一方面,这些生动的形象、戏谑粗俗的大众文化元素使得符号的含蓄意义能广泛地传播并被接受,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隐匿的、狡黠的、多变的,便于避免言论规制。由此,网民以符号的多重意义运作,实现了权力关系的调整或反转。

#### 四、抵抗与对话:网络符号抗争的话语功能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符号冲突,体现了网民与主导意识形态对意义及符码连接的“领导权”的争夺,具有抵抗的一面;同时,这也是网民以另类的方式与主导话语进行对话与协商的尝试,体现网络符号冲突的双重意涵。

##### (一) 抵抗:建立替代性话语空间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所谓“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现象。如果说每个符号都代表了网民所建构的一种社会现实,那么这种现实便是一种如迪卢卡(Kevin Michael DeLuca)所说的“替代性社会现实”(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它所指涉的话语体系称为“替代性话语空间”。“替代性话语空间”体现了“浮动的能指”这一“话语溢出”现象。话语、符码的“接合”实践可以有效改变其原有的指涉属性,赋予新的属性。网民正是通过建立不同于主导性话语的“替代性话语空间”,实现文化意义上的抵抗。

迪卢卡进一步指出了接合实践得以发生的两种话语行为:符号陈述(speak forth elements)和符号勾连(link elements)。符号陈述“主要强调对于运载意义的符号概念的发明,以便搭建一个话语性场域运作所必需的符号体系”,意指对对象符码的选择和界定,以特定方式进行表征。而符号勾连“主要强调特定的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关联关系,符号勾连的目的就是使得符号所运载的意义能够在‘话语性场域’内为特定的旨趣群体服务”,强调改变事物的所指意义,建立新的连接关系和意义。(DeLuca,1999,p.38)“替代性话语空间”便通过这样的生产机制来实现话语认同:断裂(或忽略)原意符的接合关系,建立新的联系,以此重新界定话语秩序与意义,通过“替代

性的社会现实”来引导公共舆论的集体生产与转向，最终实现话语背后特定的阶级权力、政治权力、文化（符号）权力的合法化再生产。

## （二）对话：符号抗争的深层意图

网络符号抗争既有抵抗的一面，同时也是处于弱勢的草根民众试图与强势的主导性话语进行对话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互联网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制造差异”的亚文化风格特征。

互联网自诞生起就体现了对话精神。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洞察的，“文化工业”时代的广播电视等媒介单向、独白，是独裁式的，是“无回应的言语”；相比之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双向型、去中心化”“重构主体”的媒介时代可算作“第二媒介时代”（2000，p. 38）——就“沟通”这一内在传播特性而言，互联网可谓是完全意义上的“交流媒介”。交流与对话，首先意味着承认不同于自我的他者的存在，预设了两个以上平等的对话主体，绝不是传统媒介时代的“一言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也通过否定“独白”，将“对话”提高到人类生活的本质和一切意义的源泉的高度（李智，2000）：“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998，p. 340）

我们需要以“对话”精神来理解形形色色的符号冲突现象，尽管这是一种被改头换面的、古怪奇特的“对话”方式。不少学者强调了“对话”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重要性，如李红和董天策认为，“研究网络公共事件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的，这是有效传播的基础，也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而且“从逻辑归宿上来说，相关研究将力图解决社会共识和社会认同的问题，这是一切网络公共事件冲突的总根源。”（2012）的确，当前不少民间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共识的断裂”或“认同错位”，而网民制造的各种冲突性符号，可视为对这种断裂和错位的另类回应。这种沟通意图隐藏在各种变化多端的行动策略背后，有时是对抗，有时是尖刻的讽刺，有时是漫不经心的戏谑……这正是互联网开放、对话、个性化精神的体现。亚文化研究学者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认为，在一个存在差异的内部系统中，对某些有机元素的选择和组合会形成一套既定的秩序，而亚文化则“有意图地传达一种不同的秩序。它自成一体，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建构，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选择。它把注意力引向了自身，使自己被人解读。”（2009，pp. 126—127）他指出，在所有亚文化风格的背后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的传

达” (2009, p. 127)。显然, 上述各种案例中, 网民都是通过刻意制造与主流文化的符号差异来显示自身, 以期得到关注, 进而传达某种促进社会改良的愿望——希望政府少一点官僚主义, 专家多一点专业精神和良心, 媒体多一点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 等等。可见, 在以恶搞、戏谑、讽刺为基调的话语背后, 并非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集体心态, 而是改良式的、协商式的政治意愿表达——是一种隐晦的对话与沟通意图。这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也是网络冲突性话语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之一。

**引用文献:**

- 巴赫金 (1998). 诗学与访谈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巴特, 罗兰 (2008). 符号学原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巴特, 罗兰 (2009). 神话修辞术 批评与真实 (屠友祥, 温晋仪,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白剑峰, 李红梅 (2013). 医改: 看病更省心更省钱. 检索于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1/10/nw.D110000renmrb\\_20131110\\_1-02.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1/10/nw.D110000renmrb_20131110_1-02.htm).
- 百度百科, 多毛猫 (2009). 检索于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VCGk2Wou0S30H1B6RLjpfmBmrY8eTyH7NeLVPDQZQ28835pHbIXbZJctaiBv6ft1ZoxgrMLTimkdqvlaX0akd-HX1-ZGIpSmQL4oHkMwWsu9dRXK2WR1dmF0uJJaWtp0>.
- 波斯特, 马克 (2000). 第二媒介时代 (范静哗,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博伊德-巴雷特, 纽博尔德 (2004). 媒介研究的进路: 经典文献读本 (汪凯,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冯仕政 (2013).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赫伯迪格 (2009). 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 (陆道夫, 胡疆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洪汉鼎 (2011).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 (上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霍尔 (2003).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荆楚网 (2009). 公安县“红头文件”要求一年计划抽烟 23000 条. 检索于 <http://news.cnhubei.com/ctdsb/ctdsbsgk/ctdsb02/200905/t662060.shtml>.
- 卡勒 (1989). 索绪尔 (张景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卡西尔 (2004). 人论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拉克劳, 墨菲 (2003).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尹树广, 鉴传今, 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李红, 董天策 (2012). 符号学分析: 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 新闻大学, 1, 99-108.
- 李岩 (2005). 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李智 (2007). 论网络传播中的对话精神.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 107-109.
- 刘涛 (2011). 环境传播: 话语、修辞与政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塔沙克里, 特德莱 (2010). 混合方法论: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 (唐海华,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腾讯网 (2009). 教育部回应汉字“整形”称微调参考书法美学. 检索于 <http://news.qq.com/a/20090820/000073.htm>.
- 现代快报 (2012). 给名画穿件衣服吧! 央视给裸体雕像大卫打马赛克引网友恶搞. 检索于 [http://kb.dsqq.cn/html/2012-07/11/content\\_192866.htm](http://kb.dsqq.cn/html/2012-07/11/content_192866.htm).
- 易财网 (2011). 四川会理 PS 领导“悬浮视察”网友恶搞狂欢. 检索于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95302.html>.
- 赵毅衡 (2009). 符号学文化研究: 现状与未来趋势.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12, 169-172.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DeLuca, K. M. (1999).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NJ: The Guilford Press.
- Laclau, &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UK: Verso.
- Laclau (1993). Postmodernism: A Reader. In Thomas Docherty (Ed. ).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简介:

曹洵,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文化研究、网络话语政治等。

#### Author:

Cao Xun,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new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s of internet discourse.

Email: caoxunxun@163.com